

香港城市更新中的公民参与

周如南¹ 朱健刚²

(1.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近十年来，香港政府积极推动旧街区的市区重建与及对城市版图和地方功能的大规模改造，引发一系列社区重建中产生的对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议题的社会关注乃至公众参与，也极大影响了香港公民社会以及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势态，香港的公民社会也随着香港公民的积极参与而逐渐呈现。本文回顾了香港公民参与的演变，并通过对湾仔-利东街、中环-嘉咸街和新界东北-菜园村三个城市更新案例中公民参与的过程叙事和比较研究，讨论了公民参与对于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更新；公民参与；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一、公民参与和公民社会

在安斯坦（Arnstein S. R.）看来，公民参与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民众参与为民众基于主权的认知与实践，透过公民意识的觉醒，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导向，对政府的作为及政策可以得到充分的信息，同时也有健全的参与管道，付出自己的感情、知识、意识与行动，以影响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的一种自发性的公民行动。”^[1] 克莱斯（Kress）则认为，“民众参与是提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让民众可以参与政府决策或规划的过程。”^[2] 在这里，“参与”与公共事务、政策决策密切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参与”使政府逐渐由单一统治转变为多元治理方式。戴伟信(A. Davidson)指出全球化下的公民发展,多元治理 (management of diversity) 是公共参与的重点,民主参与不再只局限于社会或国家层次的代议民主制度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只靠定期选举 (periodic election)的民主参与过于被动和薄弱,是被动公民(passive citizenship)的参与,不再适合高流动的后工业社会发展需要。戴伟信进而强调民众参与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公共事务,而国家则应该开放公共政策权力到个人生活的层次^[3]。换言之,社会需要积极开展并实践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参与性民主,需要扩大民主参与到公民个人生活的公共事务的层次上,以确保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每人喜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的权利。

要实践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参与性民主,承载人们的个体日常生活和社会网络的社区是关键环节。事实上,“社区”总是与“参与”一起成堆出现在政府和国际机构各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话语中 (Wlians,G, 2004)。社区空间也被认为是社会抗争和诞生公民社会的一个关键场所 (Read, 2003; Frolic&Miao, 2005)。作为公民空间 (civic space) 的社区空间可被看作是人们在独立于政府和私营经济之外,自主聚合并建立社会关系的实际空间。它既表达出人们无目的的可以呈现存在的公共空间,也包括人们开展社团生活的空间,它成为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活动的地点,为公民社会提供地方感以及在公民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认同、意义和连接 (Douglass et al.,2002)。

公民的社区参与在西方学术界早已受到关注,并着重于强调其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帕特南 (Putnam) 关于意大利民主政治的研究揭示出社区参与对于民主制度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认为后者依赖于本土的“公民社区”(civic community),即有多少有公民心(civicness)的公民和团体积极参与当地的公共事务,以构成公民参与的网络、普遍互惠 (general reciprocity) 的规范以及彼此的信任,这些都是民主的社会资本,使得民众集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得以可能。而在中国社会,即使存在着相对更加权威的政治制度,在社区层面仍然存在相当的公民参与的机会 (朱健刚, 2010)。由此,人们关注社区参与正因为它能够培育公民性,形成基于本土和日常情境的真正意义的公民参与,以此为微观基石,更宏观范围的民主制度才能运转起来。

同样是华人社会,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也强调社区居民们经由社区与及环境改善来建构他们的公民社会。在社区营造的实际运作中,推动“积极参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这个过程的实现。台湾的许多个案显示出,社区的居民经由成人学习计划、文化活动,自然保育、空间再建构等计划,学习公共事务的参与及民主的教育。进而社区民众的公民意识和

公民权得到深化，公民在社区活动中进行其“文化实践”，与国家进行着矛盾的协商关系，透过社区的“文化实践”，公民也不断进行自我意识的制造与再制。

有研究认为：早在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香港华人就开始有民间社会。“香港华人的民间社会和公共领域很早就开始萌芽。”，“有大量不同性质、规模大小不一的民间社团。由街坊组织、行会、商会、同乡会、工会、文教团体、宗教组织、华人互助社团、以至外国组织所促成的志愿机构，各式各样。”然而，尽管这些民间社团联系了华人社会与殖民地政府，“但对一般市民而言，这种政治联系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事实上，战后初期的香港社会被形容为一个“难民社会”，市民在公共事务上的参与十分有限。”^[4]

刘兆佳提出“社会容纳政治”的概念，认为香港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由家人、亲戚、朋友甚至同乡所组成的资源网络，以互助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上所遇到的多种问题。由此，香港市民毋须利用在公众领域的各种机制（如政治动员或集体行动）来应付问题，客观造成华人社会政治淡漠的社会状况。可以说，很多香港市民的集体参与或社区参与依然在私人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之内发生，是“私”领域，而非公共领域，不能说是公共参与/公民参与。金耀基认为在殖民地时期延续下来的“行政吸纳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模式之下，香港的社会参与也只是“草尖式（grass tops）”的途径^[5]，把社会的精英吸纳进巨大的行政机体中，而非真正的群众参与。基于此，部分研究将香港华人称为“关注的旁观者”^[6]。总而言之，香港的政治参与的实际水准较低且偏于非制度化。

那么，在香港这一全球化都市，近年基于社区的公众参与的发展势态及特征如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培育香港民众基于基层本土情境和日常实践的公民性，催生真正意义的、对香港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自主的公民参与？进而这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又有怎样的长期影响？这正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香港社会一方面被看作是一个公民参与冷漠的城市，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移民社会里，很多人都只是把香港看作暂居地，对于周围的社区并不关心。但是另一方面，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经逐渐地沉淀积累出越来越强烈的本土认同，香港越来越多的市民积极参与各类社区事务。限于篇幅，本文集中在几个近年较为引起关注的或涉及香港核心市区旧街区拆迁重建、或涉及新界东北发展及基建中迁村问题引发的社区保育及抗争个案，通过具体探讨其行动策略、公众参与的途径和平台，运动的公共论述以及议题框架建构、抗争合法正当性的建立以及本土化等方面，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一点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二、香港公民参与的历史和新趋势

香港现今的公众参与以及基层社区参与的发展势态，必然与之先前长期的公共/公民参与的历程及历史积淀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首先对香港的公共/公民参与状态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回顾。

战后大量难民涌来香港，带来种种社会问题。殖民政府无力应对，社团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社团在政府鼓励下成立。如1950年代的街坊会和1973年作为反罪恶运动的一部分而组织起来的互助委员会。有些团体甚至是政府下令成立的，如旅游联合会和工业联合会。因此香港公民社会有着很强的国家因素，其发展基本上是国家驱动的^[7]。不过六十年代，受大陆文革的影响，香港开始出现抗争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团体，由此，70年代被“称为压力团体的‘压力政治’年代”^[8]，而80年代随着论政/参政团体的兴起，众多压力团体以及社会运动组织转向参政的政治参与模式，连一些向来只扮演基层利益团体角色的居民组织，亦全面投入地区选举。同时，“在政治空间急剧扩展下，参政团体迅速发展选举基地，介入基层社区，...一种以参政主导的民众动员，逐步取代原来强调自发的组织方法。”配合选举而成立的“议员办事处”、“地方关注组”成为基层新兴民众动员组织。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参政团体尝试亲近和争取基层的举动，“在建构阶级或社区认同上，并未见到效用。...民众运动有点像“无主孤魂”——一部分基层团体被选举政治所吸纳，而另一些则在政治制度的边缘挣扎。”^[9]因此，即使香港社会团体向来数量众多，自战后至70、80年代社会力量已经在相关公共参与有不同程度和侧重的飞速发展，但都并不表明香港基层市民在社会公共议题和事务上有足够程度的参与。换言之，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未必能被诠释为公民社会的实质成长。此外，华人社会向来“公民意识”薄弱，80年代之后香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兴起，反而分化了香港公民社会以及原先相对团结的建制外力量。而政党竞争、投票式选举民主等因素，亦有可能强化成员的私利意识、敌意、对基层民主参与的被动与消极态度，“公民”转化为“选民”，甚至在基层社区中逐渐地方派系化和街坊化。

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香港回归后，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令香港经历发展低谷，房产泡沫、负资产、高失业率、高财赤，以及新移民、母语教学、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

民生、文化教育问题，推动香港此后几年的示威游行数字逐年攀升。另一方面，香港政府依然延续政府单向策动的大规模旧区重建，由回归初期的衙前围村、大磡村、利东街，以至深水埗重建计划，都表现出香港政府的霸权式的经济发展主义。与此同时，回归数年后，港人的文化思维也逐渐变化。回归前后港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处于相当模糊状态，这可谓政治上前殖民政府的去国族化，社会上港人的金钱至上、寄居者心态而导致的文化认同欠缺，加上心理上港人的恐共和对中国概念的歧视心态互相交织的结果。随着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浮现的催生，港人开始展现对自我身份追寻的愿望，并开始重拾自身文化的价值。部分港人亦开始反思一直以来香港“中环价值”^[10]所代表的商业和工具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

以上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支撑，同时也为香港 2000 年之后文化保育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基础。港人的保育意识随保护海港协会反对维多利亚港填海工程而孕育，至 2006 年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事件时达到高峰，行动者的“本土行动”经由公共知识分子如梁文道等讨论，港人开始反省经济发展主义，提倡本地的文化价值，反对香港的盲目发展。天星、皇后码头的保育运动可谓是香港文化保育运动的成熟期，舆论关注重建、清拆活动的着眼点已经是探讨如何保育文化、保留历史，而非过去的以赔偿、经济价值为主的论述。政府也不得不将之作为重要及迫切需要处理的议题来回应。

香港的社区参与，也即街坊们基于在地社区的基层民主（不同于投票、政党式的精英民主，或前文谈及的“行政吸纳政治”，而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的具体实践，随着文化保育运动从抽离日常的街头抗命到本土街坊的逐渐介入和参与行动，开始被不断重视和充分发掘。特别随着近年香港政府积极推动旧街区的市区重建与及对城市版图和地方功能的大规模改造，落脚于社区街坊的文化保育和重建的议题也便随着新规划的推行而变得日益尖锐和逼切。值得庆幸的是，天星及皇后事件过后，保育及集体回忆的浪潮仿佛没有退减的迹象，反而是更深入地转移至社区重建的层面。例如利东街、H18 嘉咸街及卑利街等，形成了一波因社区重建而引起的社会运动。它不单是皇后以及天星码头保育浪潮的延续，更可能是香港形成重视人文价值及社区参与的“亚文化”^[11]，挑战以“中环价值”为香港核心价值的社会运动的新一波浪潮的开展。更进一步，近两年来，经由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过去的社会运动式/街头的公共参与，以及民间团体推动的公民义工参与逐渐拓展向在地的社区参与。这种参与以香港街区/基层社区成为重要阵地，街头与社区开始更多互动勾连，而文化保育运动，也逐渐从媒体主导和精英带领为主，到更多街坊民众的参与，部分呈现为社区为本的香港本土文化运动。我们通过几个典型案例来分析这类公民参与的演变。

（一）湾仔-利东街案例

利东街位于香港岛的中心地带湾仔旧区，是香港独一无二的一条街。从过去的裁缝街，到70年代著名的“印刷街”，到80年代转型为喜帖街后，由于整条街道同类商铺集中，能够为客人提供更多选择，于是成为香港人采购印刷品和喜帖的首选之地，亦呈现香港的独有文化。就建筑意义上来说，利东街中段唐楼以并排的方式建筑，亦是香港岛绝无仅有的。由此正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吕烈丹所言，利东街“见证了香港印刷业的发展过程，具有独特的本地历史和文化价值。此外，利东街的建筑也是香港城市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有代表性的民居。……反映了香港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民间生活文化和历史，凝聚着公众的集体回忆，具有历史、社会和人类学方面的文化价值”。^[12]

由1997年10月起，利东街被划入官方重建计划，“H15”是市建局在香港湾仔老区的另外一个项目，涉及湾仔利东街及麦加利歌街等8条街道，地处湾仔中心地带，占地8900平方米。政府2004年10月宣布重建此区，是市区重建以来最大的项目，发展成本预计35亿7500百万元，涉及647个业权、100多家小商铺，930个家庭、2000多名居民，赔偿费用约为17.3亿元。喜帖街的重建计划引起当地居民、乃至全港市民的关注，亦引起社会大众对历史保育的关注。2003年10月重建计划启动，市建局正式重启H15项目：将利东街及其附近一带，纳入市区重建计划，并命名为H15（香港岛第15个项目）。市建局计划搬迁这里的全部居民和商户，清拆所有房屋，建立簇新的豪宅、商场和写字楼。重建计划引起当地居民和社会各界强烈回响，很多人忧虑没有妥善的居民安置计划，也有不少社会人士认为重建会扼杀了喜帖街以及湾仔旧区的传统香港特色和本土文化，同时也会破坏利东街以老人和小型店铺为主的弱势群体的社区网络，殃及极富特色的喜帖和印刷本土经济。

重建计划正式公布后不久，街坊们在圣雅各布福群会社工的帮助下，正式成立H15关注组。H15关注组开始作为一个志愿性的居民组织正式成立，并强烈要求参与市区重建，参与决定自身命运。关注组民主选举了社团负责人，并在警务处备案登记，开始以组织的名义与政府协商保留历史意义浓厚的喜帖街。H15关注组有核心成员20多人，身份有铺户，有住户，有业主，有租客；关注组得到大部分街坊授权，作为居民代表，不时召开街头记者招待会向各大媒体及各团体发放消息，表明立场和观点，通过请愿、游行示威、游说、街头记招、挂横额、等各种行动方式，与市建局、城规会、立法会等权力部门沟通交涉，表达对市建“推土机式”重建手法的不满。

利东街事件持续在公民社会领域带来反响和支持行动。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文化人、传媒人等，如吕大乐、吕烈丹、李欧梵、董启章、马家辉等人，透过发言、文章，引起民众的更多关注和支持；并为运动起着文化建构(Framing)^[13]的作用，利东街问题与更大的社会议题如城市规划等联合起来，与类似的公共事件如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事件结合起来讨论，将议题从“楼换楼、铺换铺”等经济层面的口号提升到“文化保育”、“公共空间”、“民主规划”等文化政治层面，与运动互相推进。2004年，社会各界在西九文娱艺术圈的论争推动下，把湾仔重建问题从一个社区更新问题提升到成为一个关乎民主发展、身份认同、本土文化和人文思维等议题。

但利东街的街坊们及其主导的H15关注组依然是运动的关键主角，2005年2月，利东街的街坊们通过长期学习钻研、主动请教专家，参考外地经验范例等途径，完成了香港历史上首次由下而上、由居民设计的重建方案：哑铃方案，呈交给城规会。这种替代性方案和理念的提出，带来了社会讨论重建、参与重建的强大动力，也成为其它重建区效仿的行动模式。

2005年11月5日，《收回土地条例》生效，绝大部分居民、商户迁出利东街之后，关注组作为社会运动组织继续存在。关注组根据不同形势发展，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如“看我们的利东街——我们要民主规划大会”、“利东街节”、《黄幡翻飞处》新书宣传会及系列分享会、电影放映会、征文比赛、文化导赏团等，并借助由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等保育活动的思考和辩论，将利东街运动始终保留在香港主要社会议题之中。进而，关注组于2007年9月提交了针对市建局方案的“纠正方案”期望保留中段唐楼。

2007年9月，市建局开始清拆利东街。10月5日，20多名关注利东街运动的青年进入利东街地盘，劝阻工人施工，并在街头示威。11月中旬，H15关注组再次以原居民的名义提交新的规划方案，要求保留利东街中段唐楼并减少车位。2007年12月23日，关注组成员叶美容因为反对市建局在城规会开会审议关注组新的规划方案之前，就开始清拆尚存争议的利东街中段唐楼，愤而在街头进行“无限期绝食”行动表示抗议。2008年1月11日，城规会否决了居民再次提交的“改正方案”。3月，利东街中段唐楼已经被夷为平地，完全成为一条通道和临时停车场。街坊们的愿望基本落空。利东街保育运动基本宣布失败。

不过利东街的影响已经超出这一个单独个案，在“重建监察”组织成立后，甘太、徐生、叶美容等利东街的街坊行动者们，成为了其它重建区街坊的带路人，分享抗争经验，也把民

主规划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带进其它重建区，带动其它保育运动中的社工和义工，如何让居民参与，如何扩大社会支持基础。

2008年3月，利东街完全被清拆之后，H15关注组接受乐施会的资助，成为一个半职业的公民社会组织，“决定会继续关注与旧区发展、市区重建和城市规划民主化有关的社会事务。”^[14]至今，利东街经验以及H15关注组，持续为其它社区重建以及香港基层公共参与起到重要作用。

（二） 中环-嘉咸街故事

中西区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地区，当中位于中环的嘉咸街街市更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早的露天市集，距今约有150年历史。市区重建局尝试用新式高楼将这一历史悠久却依然充满活力，代表着香港特有文化的露天街市取缔。

H18的重建计划^[15]早在1999年获城市规划委员会通过。由于土地发展公司的倒闭，这项计划便不了了之。市建局和中西区区议会在2006年6月举办了咨询会，收集公众对重建计划的意见^[16]。起初嘉咸街重建只谈赔偿方案，与以往的重建论述没有太大分别，甚至政党也以赔偿为关注重点^[17]。重建计划公开之后，一位居住于中环的外国人Jay Foster，得悉嘉咸街将被清拆和重建的消息后，主动联络了中西区关注组成员罗雅宁，希望她可以尝试阻止嘉咸街街市的清拆。与此同时，Jay Foster是一名本地的艺术家，为了传播保卫街市的讯息，他筹办了一个本地的艺术展览“High & Dry”。这便是保护嘉咸街街市运动的起源。

直至2007年7月，更多的关注者加入进来，保护嘉咸街街市运动以关注街市文化的网络Save the street market的身份出现，开始处理H18重建的问题。参与者当中不乏曾参与天星、皇后保育运动的成员。他们把保护嘉咸街街市运动定义为本地文化保育行动。故此，H18重建的抗争，遂成为文化保育抗争中的一部分。在2007年9月，Save the street market进行首次“街市闪一闪”活动，及至十月，运动发起筹备“嘉咸街市节2007”，向市民宣传（露天街市文化正是香港独特文化），希望引起社会更大的回响。此时，Save the street market除了最初发起的中西区关注组以及相关外国艺术家之外，思网络以及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也成为核心成员，形成一个流动松散的行动网络。

整个保护嘉咸街运动是由一群来自中产、文化艺术、外籍人士所组成。他们以采取较和平的方式，以别开生面、带有艺术气息、以文化艺术传播为主要宣传和行动策略，并没有大规模的示威及抗争。另外，在11月的为期三星期的街市文化节“嘉咸街市节2007”，主要

是向市民宣扬露天街市文化正是香港独特文化。活动包括学者讲座、工作坊、以街市货品制作的时装表演以及街市文化游等。筹办者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去表达街市的独特价值并广邀传媒报导。

“Save the street market”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得到外籍人士关注，使活动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首先，在活动初期“Save the street market”已经得到《HK Magazine》作赞助媒体，一直为活动的动向作宣传和报导。《HK Magazine》是香港主要的免费英文杂志之一，以期刊形式报导城市生活消息而吸引到大批外籍及中产读者。因为同类型的杂志寥寥可数，故《HK Magazine》特载的消息往往在其“目标读者层”具有高度渗透性。几乎所有“Save the street market”之活动和宣传都得到《HK Magazine》报导和支持，大大帮助了“Save the street market”的消息传播。

“Save the street market”的成员皆意识到完全保留嘉咸街街市原貌几乎不可能，因此，嘉咸街保育运动的目标并非单纯保住街市，而是有三个长期目标：一、提高公众对香港特有街市文化，以至其它本地文化的关注；二、希望透过举办不同的活动，向市民灌输文化保育的意识；三、改变政府单以经济发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

然而，外来的艺术家、文化精英、社运和保育人士们和嘉咸街本土居民以及商户的视角及关注点不尽相同。虽然大多也反对市建局就嘉咸街进行推土机式的重建计划，但就重建区的居民及小贩商户而言，他们所重视的，并非嘉咸街有多大的文化价值，亦非公众参与的，而是重建的赔偿及搬迁安排，以及生意如何经营。故此，他们所接纳及认同的，并非“文化保育”的框架，而是“重建赔偿”的框架。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问题，而支持保育团体的抗争。以上努力和行动，使得嘉咸街重建项目持续引起巨大争议，香港政府2010年12月宣布，为了保育这个百年市集，重建项目将分阶段进行，受影响的商铺会搬到地盘内的另一处，工程完成后，再搬回新街。整个重建成本增加2亿港元，时间延长18至24个月。

（三）新界东北-菜园村故事

香港石岗菜园村，一个有着150户居民的自然村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来自中国大陆潮汕、闽南地区的移民定居到此，拿着政府发的临时耕作牌，盖了临时农舍，住了下来，数十年的辛苦打拼，如今菜园村的村民，都是当年移民的子孙们，多从事农耕劳作。

菜园村的社区抗争以及重建运动，源于香港反高铁运动。酝酿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香港高铁，是广深港高铁在香港特区境内的部分，今后将与京广高铁连在一起，香港将融入全国高

速铁路网，密切与内地各大城市之间的联系，对香港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香港高铁预计耗资 669 亿港元，作为香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基建项目，引发广泛争议。2010 年一月，高铁拨款案经立法会表决通过的消息传出时，连日等候在外的上万市民反对者的不满的情绪瞬间爆发，警民间发生激烈冲突，被认为是 1997 年以来“最严重的官民对立”。

虽然“高铁”拨款方案获得通过，但对许多参与其中的 80 后年轻中坚力量们看来，“反高铁”的过程为香港人上了一堂公民教育课，不但了解到社会以及政府内部的问题，香港市民对城市的发展方向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而持续至今的菜园村社区抗争行动无疑正是这一认识的典型延续，因为菜园村的所在地将在未来成为广深港高铁的紧急救援站及列车维修厂。

香港特区政府要求菜园村 150 户居民在 2010 年 10 月前迁离。自 2008 年始菜园村卷入反迫迁抗争，到如今的菜园新村建设运动，菜园村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抗争面向，唤醒了各界关注：学生和环保团体加入保护生态和土地的行列；公共知识分子提倡文化保育；相关民间团体和社会运动者则为村民的生存选择权以及相关权益呐喊。由于各种请愿、游行、宣传会、义卖、音乐节活动，菜园村也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学生团体以及年轻人参观或者以义工方式加入。

而贯穿整个运动的一个核心议题/理念，“就是新界‘非原居民’农村^[18]不能继续成为被政府和地产商征收的待宰羔羊，新界‘非原居民’农村要争回自己的尊严。”菜园村民两年多来从没放弃这个核心争取。2010 年 2 月之后，高铁建设已成定局，为了实现最大的团结，保住社区，菜园村民宣布集体重建家园计划，要为“非原居民”农村创立搬村的先例（目前只有新界原居民有集体搬村的权利）。菜园新村重建家园计划于 2010 年 2 月宣布后，一些热心实践参与式规划的专家组成“菜园村生态社区营造工作室”，与 47 户村民共同筹建菜园新村。自此之后，菜园新村就成为运动最大的目标。

菜园新村从无到有，历尽波折，村民用了七个月争取复耕建屋牌照（2010 年 3 月至 9 月）、十个月买地（2010 年 3 月至 12 月）、一年参与规划（2010 年 4 月至 2011 年 4 月），还有纠缠了七个月的新村路权问题（2012 年 8 月至 2011 年 2 月）。在此期间最大的冲突和事件，是 2010 年 11 月始延续数月的护村行动和抗争：当时因为复耕牌只容许村民在农地上建屋，村民费尽周折辛苦，才找到合适的一片水土较好适合耕种的农地，但当村民要购地时，却有不明势力索取 500 万路权费，政府一方面声称私人买卖不便介入，另一方面却在旧菜园村开始收地迫迁。

政府的行为激发了更多外界力量对菜园村的关注,当时数以百计香港市民进入菜园村组成巡守队,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每天和村民一起在菜园村巡逻,示威,以身体挡住推土机、烧焊机,为菜园新村的实现换取时间和增添力量。2010年11月19日香港地政总署预计到菜园村大规模“收地”的日子这天,菜园村关注组、支持组、巡守队于是动员支持者600多人参与当天护村行动,发动了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行动,最终以地政署宣布取消当天收地行动告终。

相持的数月,巡守队成为菜园新村计划得以落实的关键,他们的行动以及相关媒体报道在几个月间累积了庞大的政治压力,最终于2011年初,乡议局声称有善长仁翁购入路权,才解决了问题。此后菜园村关注组决定不能再拖延菜园新村的兴建计划,因此,菜园村关注组和生态社区营造工作室的专家们,在二月底开始与政府和港铁讨论中途安置方案。同意港铁于菜园新村选址的“公共耕地”内,建设十八幢临时房屋,暂时安置菜园新村的村民,直至菜园新村建成。8月村民分批离开菜园村,迁入菜园新村的临时屋。此后新村村民成立小组逐一处理公共土地持有、村务管理、有机耕种等公共事务,亦派代表参加“永续栽培设计证书课程”,希望将永续农业的实践带到菜园新村,使得当地社区成为富有影响力的民主永续社区。

一批外界的年轻社运者和行动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进来。社区的建设和参与在缓慢然而坚韧地展开。在关注组、规划师和外界支持者的帮助下,菜园新村进行了用心的生态规划,一些村民组成“农业先锋队”开始试行集体有机耕种的模式,发展出许多有机产品,周末依然吸引很多市民和学生来参观,参加义卖等。而在此前村民们的未来计划以及构想中,等新屋盖好、临时屋拆除后,村里会多出四万多平方英尺的耕地。争取每户村民拿出自家土地的四成,作为集体所有的公田,这在香港来说,是个新颖且值得期待的尝试。

三、香港公民参与的策略特征

基于上面三个事例,我们将香港公民参与中可能涉及到的策略特征主要分为下面四类:第一类是较为常规传统的、政治化/或面向政府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运动策略:如建制内允许的游说、游行请愿、新闻发布、联署上书等公开动员策略,还有民间发起的公众参与政策建议(包括环境/社会评估等等)、甚至向政府提交替代方案等活动,这一类里面也包括一些较

为非常规不合作的、甚至溢出建制外的公民抗命行动，比如，阻街、拦阻施工、静坐绝食示威等。这一类行动模式的参与平台是街头和媒体，而影响渠道主要是借助媒体和公共话语的广泛传播渠道，尤其是电视报纸网络等等；也有一些街头行动因为规模比较大，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是民众即时参与直接行动而体验到的公共参与意识以及意义的飞跃提升。

利东街重建替代方案的提出，以及青年阻街行动、绝食抗议等都属于第一类，或直接对政府起作用（前者），或通过轰动性事件间接施压政府，虽然阻街和绝食也涉及街头行动，但参与规模和平台较小，主要的运作平台和影响渠道还是媒体，通过将媒体放大和发声，来获取民意支持实现倡导作用。但相对而言，向政府提交替代方案这一更为温和以及建设性的策略对利东街而言更有成效也更带来示范效应。

菜园村事件中，对第一类策略有大范围运用，包括反高铁阶段的立法院前抗命示威，到2010年11月始延续数月、与政府收地行动的直接对峙：再到每年的七一游行。这一点和几乎极少和政府互动介入政治性参与的嘉咸街保育运动形成明显对照，而和利东街的不同，则是菜园村相关街头（或社区当地）直接抗命行动更频繁、参与面更广，也因此，在依赖媒体扩大传播之外，也对直接参与的菜园村村民和关注者有更强的激励和动员作用。

第二类是文化艺术、娱乐传播类的面向广大公众的公共活动：比如纪录片拍摄、展览会、文化节或主题节庆、街头行为艺术、文化导赏、征文比赛等。这一类行动策略比较“软性”，相对温和并避免对抗和抗争性，因此覆盖面和可接受度也较高。它的参与平台和影响渠道主要是媒体和公共话语平台，除了电视报纸网络，也包括社运界和当地行动街区等针对性的平台和传播领域以及媒体，而网络尤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正基于此，传播影响力度较深的，以对此议题较为关注、同时日常严重电子媒体和网络的群体为主，比如相关文艺界、知识界或者社运界、部分白领阶层等等，对于一般基层香港街坊（甚至哪怕这类公共议题所直接关涉的社区基层民众）的影响和覆盖面则有限。另外，从影响效果和层次上看，对于香港广大市民而言，除了少数有机会直接参与者可能获得较强的参与意识，依然是相对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或观众。

这一类行动，在三个个案中都屡见不鲜，并且在运用上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为一定范围内的公共参与动员起到了作用。但嘉咸街运动对于这一策略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依赖显著突出，特别它最初运动发起人的特殊背景的缘故，长期依赖国际媒体和英文媒介作为传播渠道，最初受众也多是艺术界、白领精英和外国人以及游客等等，也正因为此，虽然这一

策略的运用非常有活力、现代时尚感和创造性，但对于嘉咸街本身街坊以及商户的影响和感召力非常有限，甚至存在隔阂。但后期，这方面问题有所缓和。

而对于利东街和菜园村而言，这一策略的广泛运用，对于“软化”运动本身的抗争棱角，提高公众对于这一议题的认受度，有明显作用。以利东街为例，有利东街运动纪录片《黄幡翻飞处》以及同名书籍、主题文化衫、展览（哑铃方案展览）、摄影（“整整一条利东街”画册）、漫画（如利东街非常有名的和尚打伞图，以市建局长官为形象，指市建局“无法无天”）、行为艺术、电影讲座等等。

第三类是建设性的、以信息分享和能力建设为导向的行动，包括面向公众的信息发布和咨询活动，专题工作坊、分享会，以及一系列的公民教育活动，比如公众培训和工作坊、组织文化导赏、出版、接待访点交流等等。这一类行动策略以建设性、培力性和针对广大公众的倡导宣传为特点，也因此，它的参与平台和传播渠道是广泛的公共空间和话语平台，包括媒体、日常或常规化的社区/城市活动场地空间、学校等等。并且因为它所具有的明显的公民教育特点，对于香港广大市民，尤其是在校学生等年轻人群体，有很好的影响和动员作用，但另一方面，它面向受众广、流动性大，强调的是知识传播和公众普及度，对于特定议题的深入度和在地性可能不够。

这一类行动策略在本文的不同社区参与个案中，都有采纳和运用，尤其在利东街个案中，随着 H15 关注组的丰富成熟经验，尤其在其转化为半专业的公民社会组织之后，更是着力推动建设性的培训、工作坊和公众教育活动。同时也因为关注组是基于长期在地经验，由基层街坊代表和义工一起组成，因此也能够避免这一类行动策略的相对广泛不够具体的不足之处。

第四类是基层日常展开的、以街坊为主要参与群体/受众，更具有地方特色和本土脉络的社区行动，比如社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集体有机种植活动、社区/村落自发的周末农墟、街坊分享会、动员会和咨询活动等等。这一类的参与平台和影响渠道更多专注于在地的基层社区，通过本土社会关系、以及街坊们、外界义工为主体的各类公民社会网络作为主要的传播影响渠道，是更加日常、常规、并与基层街坊民众的生活、生计、社会文化脉络息息相关，由此，有可能最大化地实现社区本土动员，推动基层民众的公共参与，培育积极的参与式公民。对于当地街坊以及一些外来参与的关注者，可以在这类日常践行的、相对常态小规模 and 温和的行动场景里实现参与意义和公民意识的提升，进而有助于社区内在的集体认同、内在

信任关系、凝聚力以及参与者的身份认同的进一步深化和持续。

但另一方面，因为它的日常生活化和本土性，缺乏戏剧性和新闻轰动效应，并不容易吸引到媒体的关注。比如菜园村和马屎埔村关于周日农墟、农民市集以及有机种植的尝试，比如利东街关注组日常在街坊间展开的动员说服活动、个体咨询服务等等，都隐藏在本土的日常生活脉络之下，很难被媒体、公众以及政府关注。

总之，在香港近年社区参与，特别是我们上面举出的几个个案中，这些不同类别的行动策略多少都有所涉及，比如在利东街保育运动中，涵盖了所有的行动策略，而且都较为深入和普遍。但对于整体的香港的社区参与的行动策略和参与平台/管道而言，可以看出，还是相对比较依赖街头和媒体，影响渠道主要是借助媒体和公共话语的广泛传播渠道，尤其是电视报纸网络等等，因此，这类相对虚拟空间内的参与，和市民真实的生活场景还有一定距离，使得民众更多是旁观者关注者，而非实际行动者，对于形成更广泛的公民参与的群众基础，还并不足够。另外，这一类依靠媒体传播的公共参与行动策略，在相对温和建设性的行动，比如利东街保育运动中，比较有效，也能够较大的得到媒体的关注和助力，但对于菜园村以及马屎埔村这一类牵涉到较为争议性的新界东北发展和农地回收、以及非原住民农人的权益问题的事件，基于它的敏感度，以及小众化框架和论述：特别是部分反对资本主义、中环价值以及后物质主义的论述，并不太容易在一般港人中获得认同。

当然，另一方面，香港长期孕育的街头政治/抗命传统，包括近年的维持相当规模的七一游行等，都以直接的、戏剧或激情式的、公开化并具表演展示性、甚至公开对抗的集体行动的参与空间，来催生千万参与者本身以及这一群体内部的具有爆发力和强度的意义建构以及认同/团结感形成的过程。依然为大量港人提供机会，在具体亲身的集体行动的激扬场景中，提升自身的积极公民的参与意识、意义和认同感。但这种特定场景的、非常态、甚至往往一年一度或几次的非常规行动，依然很难替代沉浸在日常生活和践行中的本土化的积极公民参与。后者通过日常说服性沟通和共同行动等等，逐渐使得从之前的街头大声说不，到基于日常生计、社会和文化实践的建设性；公民参与群体从之前社运组织/民间团体/行动精英的网络、公共知识分子文化界媒体界的小众圈子或网络，拓展到基层民众和本土社区的街坊。

四、公民参与的意义建构与合法性

香港近年的公民参与体现出意义建构的转变,而这种意义建构则与积极参与和组织居民运动的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密切相连。

(一) 议题及意义框架建构特征

从媒体和公共话语来看,香港的公民参与,特别是基于社区重建进而社区参与的个案而言,在议题和框架建构上都循着大致的方向拓展和深化,这一点,在本文的几个个案中也可以看到互通相近之处:对于相关议题的公共论述,多是从经济层面的“赔偿”问题和技术可行性问题,到历史及文化保育,政治层面的“民主规划”(公众参与民主决策)问题,到社区网络和社区生态的保存,到城市规划、香港“我城”的“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到反(思)质疑物质/发展主义、资本主义及中环价值,进而在近两年,开始重拾农耕价值、对乡土“本土化”以及个体生活方式进行反思。

这背后其实反映出香港社会民众参与的论述和话语框架的整体演变趋势: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是社区维权和基层权益保护运动兴盛的70-80年代,公共论述上都是以经济和权益来探讨社区问题,直至回归之后,从发展主义、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和框架出发讨论针对社区重建的问题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从媒体报章上的论述演变来看,1998至2002年的报章论述虽然已包括文化、文物、古迹保育、重建、环保等多方面议题。然而,重心并非文化及历史价值,而是经济价值及技术问题。例如大磡村的英军直升机场重置、山顶官舍重建,衙前围村的重建,只谈及如何安置、赔偿的问题等,舆论中缺乏保育的考虑。之后,随着2002年市区重建局(市建局)的成立。市建局进行大规模收楼,重建的议题在此阶段被大大扩展。开始看见讨论重点的转变。例如当时谈及利东街重建,关注的是社区网络的破坏。如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失去社区网络会令居民营商困难。报导中对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得关注愈来愈多。当时中环天星码头的清拆也在当时开始计划,报导的重点已转为天星码头作为香港的地标,其历史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延至2005年,社区自主的讨论开始涌现。利东街的争论一直持续,居民向市建局建议由他们自己去规划利东街的未来发展,然而最后却被市建局以缺乏学术根据,“不够专业”为由拒绝接受。我们可以从中看见,重建问题逐渐发展,论述的框架得到逐渐扩大。2006年后,随着天星和皇后码头的保育运动日益升温,关于“文化保育”的论述炙手可热,文化价值的框架,是于天星及皇后事件中保育团体一直所重视的,并于利东街、嘉咸街等的保育运动中都得到延续。进而保育团体面对官方建构的“发展就是有进步,反发展就是保守落后”的论述,开始强调“公众参与”及“身份认同”的框架,以“延续”并“更新”保育运动的论述,提出了城市规划及重建的设计,应由公众与市建局共

同商讨及重新规划，而非政府单向式的咨询。同时指出让公众更多参与相关社会议题的政策制定，也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寻求过程。（张炳良 2007）而近两年，这一论述更随着香港“本土性”以及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化，新一代年轻社运者的参与，而结合自身生活方式反思以及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质疑，提出更进一步的追问。

这种论述和框架的拓展、不断演变和深化，进而到今天的多种议题框架及公共论述多元并存、跨界互动、百花齐放，甚至在一个社会事件或行动中，都会呈现不同议题框架的交汇融合，这也反映出香港整个公民社会在公共论述和框架的演变背后的文化反思的力度，对多元化和差异性的开放度，以及社会变革的潜能。

这一特质在本文的几个个案中都有所体现。它们的相通之处是都牵涉到从经济赔偿以及技术问题，到社区网络以及文化保育，进而对发展主义展开反思的转变，但几个个案的具体议题以及框架建构也存在差异性：

利东街当地街坊主导的，但同时也受到公民社会特别是相关学者、专家等的深度影响，因此，本土的利益诉求和关注，被外界知识精英们进一步包装，两者彼此理解融合，最终就变成更强调民主规划以及“以人为本”的重建理念，框架建构面向的对象是政府，同时也针对本土街坊、义工以及广大民众，也更务实理性；嘉咸街保育运动的话语和论述，则多是来自外界从文化、艺术、历史价值等角度予以关注的外来者，诉求对象是通过媒体（很多是国际媒体）传递给（国际）社会和社会中产阶级，试图以这类人群的影响力动员更多的反对声音和争议，再影响政府，因此多从文化、文学艺术、香港特殊文化/生活感的留存等框架来表达，这个框架和论述是针对外来访者、游客和好奇者的，而非嘉咸街的住户和商户。而对于菜园村的行动者而言，保护位于香港新界偏远村落的菜园村的话语框架，不可能是“文化保育”^[19]，这一非原住民村落很难说具有公众认同的文化历史意义，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保育行动者也投身其中，但更多带出的，是生态保育的语汇，而菜园村抗争和重建最主要的论述和框架，是：“抗衡主流中产社会“向上流动”、“发展主义”的城市价值，或至少提出“农耕生活”、“后物质主义”的另外生活可能，这里面的主力，是尚且没有深深卷入主流中产社会、反而是在香港现今社会形势和格局下被主流边缘化的80后/年轻一代。”^[20]

（二）公民社会的介入及合法正当性问题

在以上关于社区参与的行动策略、参与平台以及议题的公共论述及框架建构的讨论分析中，可以看到香港近年公众在基层社区层面参与逐渐深入，同时更为在地和多元化，不单单

是基层民众，社会各界人士都得到契机在本土基层的参与践行平台上从“关注的旁观者”转化成为直接的行动参与者和积极公民。这样的势态得以形成，与其背后香港公民社会相关力量对香港基层民众和街区事务的关注和介入息息相关。

比如在利东街个案中，不同领域的公民社会力量都有介入，公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艺术工作者、媒体等等在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义工及支持网络甚至更延伸往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学者、家庭主妇、小业主、弱势群体等不同阶层，多元化的职业身份和多层次的阶级身份，可以将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结合起来，或多或少开始改变香港政治生态，推动着香港的政治文化向民主化发展。而起到更为持续和组织性作用的，是一些颇有根基的香港公民社会团体和网络；比如 H15 关注组的社区网络包括圣雅各布福群会、湾仔区议会等正规大型组织，以及其他街区同样关注社区重建等相关议题的草根组织，如蓝屋关注组、街市关注组、嘉咸街露天市集关注组等等。

而嘉咸街个案中，更是外界公民社会力量起到主导的作用，其来源和利东街类似，但是更具国际化和偏重于文化艺术背景。在菜园村个案中，外界行动者和关注者的参与似乎更直接深入？进而形成“菜园村生活馆”这样的能容纳外界关注力量长期参与甚至驻点的公共空间，也正因为此，在护村运动最为严峻紧迫的时期，才能实现近百到数百的外界关注者参与到巡守队，持续数月每天报道地参与到巡守行动中，这部分地也是因为农村生活空间和面积较大的缘故，对外界关注者尤其是年轻人留驻有更大的空间和吸引力，这一点，利东街就形成明显对比：在利东街，依然很难寻觅到一处公共空间，不但是外界投入很深的几位资深义工和研究者在社区内找不到片瓦容身之地，甚至每一次的关注组会议都需要借用圣雅各福群会的场所作为会议室。在其他社区参与的个案中，也有类似的公民社会力量的介入和不同程度、基于不同平台的参与。

在公民社会的介入以及内外互动的介入中，也存在不同时期的参与人群的变化以及彼此互动协作状态的调整，比如这里面除了来自不同领域之外，关注重点也不同，最初进来基层的，多是关注政治民主的人士，后来文化保育人士迅速增加，也越来越专注于本土社区基层民众的参与，而在这些群体中，从中产精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主导，到越来越多元混杂，进而近年来，香港社会开始关注 80 后年轻人在公共参与中的突出作用。在本文案例中，也不乏年青人进入社区驻点，带动老街坊老人家，以及年轻的非原住民后代等的身影。

这背后颇具香港特质：正是在这一长期处在殖民地情境下、回归后也几经跌宕的金融国

际都市的内部，长期存在“国际”和“本土”的剧烈张力。而本土论述的热潮自六、七年前以保护皇后码头的“本土行动”开始攀上高峰。“一群‘本土行动’成员在皇后码头集会、扎营、读诗，以直接参与式的民主方法，改变或重新诠释皇后码头的空间符号意义。”也许正是在类似感召下，一群不甘进入主流或者被主流（中环价值）边缘化的年轻人开始思考土地和乡村的根对自身生活以及对香港人/社会的意义，眼光开始往下朝向基层社区和街坊的世界。另一方面，香港特色的“混搭”/香港的都市特质和构造，也决定了街头-街坊的接壤，形成公民社会-基层之间错综复杂、充满挑战也充满活力的互动。

这种接壤，特别是对社区本土参与的强调也帮助建立公民参与的合法正当性（legitimacy），这在利东街特别明显，正是因为 H15 关注组的主要参与者大多来自本地街坊，才为利东街的一系列行动提供了合法正当性进而媒体和民意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当地街坊之外的外来介入参与者，在政府看来，是缺乏合法正当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 2006 年 12 月 12 日，H15 关注组到市建局总部跟市建局要员会面商讨规划方案，社运者谢柏齐和前圣雅各布福群会社工阿洗追问市建局为何不把咨询文件公开，放在城规会的网页时；市建局的林中麟多次表达由于他们并非居民，因此无必要响应（H15 关注组就 H15 市建局的规划方案与市建局会面）。这看到外界公民社会介入的风险和不足：即使他们拥有很多资源和理念，却始终始终是外人。他们的主张和要求被视为缺乏认受性和正统性（legitimacy）；因此政府和其他相关方便有借口拒绝听从本土基层街坊的意见，甚至可能指控这些外来“多事者”一厢情愿、甚至操控街坊。

而嘉咸街案例中，外界和当地街坊商贩之间的理念看法的不同和相对隔阂更造成运动很难渗透到社区内部和本土化，使得运动相当程度上只能停留在一种公共传播层面上的文化保育运动，而菜园村和马屎埔则可以看出，即使社区参与的深入化，但非原住民本身在香港依然很难在政府和香港民众面前建立足够的合法正当性。（当然这也是香港的一个历史遗留进而在法律和情理方面存在的特有之处）。这里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力量介入基层社区的尴尬。而如果说历史文化保育在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下，依然有保护的合法正当性的话，那么农村地带，尤其是非原住民的村落，寻找自身的合法正当性的空间则更小，在不同的框架下，失去文化保育的框架之后，又要反资本主义和坚持后物质主义，不止步于“民主规划”的要求和提法，并且要在香港这样的都市强调农耕的价值，强调保护没有土地产权的非原住民，更加困难。

在这一挑战下，更需要公民社会在基层社区通过推动民众的介入，寻到更多的公共参与

的合法正当性，进而更催生街头行动和社区行动的接壤，内外力量的互动甚至进一步融合。在这方面，从本文的案例中，可以看到香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和潜能：过去外界关注者和本土社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在运动中相遇，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陌生人或者鲜少有日常个体生活的交集，不但深度参与的义工和社运者希望驻点不可得，参与提供运动话语论述支持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们，更可能只是在网络或者媒体这些虚拟世界互动，参与者们大多也只是在运动事件/抗争局势驱动下的集体行动/协作，或者七一街头上似曾相识的“邂逅”或在呐喊同一口号时的彼此注目。但是现在的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的格局更加多元，外来者有更多的契机可以加入，并且还和自身个体生活结合起来，可以参加社区里面周末或者不定期的各类活动，比如菜园村和马屎埔的“生活墟”将生活不同面向以及彼此的关联进一步鲜活化和个体化了，人们不但在政治、社会层面的公共参与中邂逅，甚至在文化、生态、农耕、生活、饮食等方面都有可能形成日常的相遇。

当然，既然公民社会在基层街区的介入以及互动还处在初级阶段，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潜在冲突，这也对双方更深层次的彼此理解互动，提出更高要求。也恰恰在这样的要求之下，香港日渐被蚕食、但相比较于高楼大厦的都市更富于公共空间和生活情致的乡村农田、耕耘其上但同时又因身处都市边缘甚至因非原住民身份而处于弱势、急需公民社会力量援助的香港村民/农人社区，可能为公民社会的介入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可操作的参与契机，特别对于香港的年轻一代，对香港有着更切身认同。相比较 50-60 年代的移民一代及子辈认为香港是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时间，如今 80 后的年轻人这样认为：“香港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是我们去承担这个城市如何发展的后果，所以我们会更热心地介入，创造我们理想的社会和生活模式。”^[21]

结论

总体而言，香港在最近几年得公民参与中，逐渐由街头运动走向社区参与，进而街头与社区参与接壤、齐头并进、并在一定程度上交织融合。形成了强调本土的香港公民社会的新形势。这种发展形势不但影响了香港社会，也进而影响到广东等内陆地区的公民社会的发展。

街头的社会运动可以帮助不同基层参与之间的互动，以及开展资源动员。相对而言，公民的社区参与的特点则是更加在地和温和，也更可持续、更日常、更接地气，另外，香港的

公民参与通过这些社区运动延展深入到本土街区的脉络中，进到过去的私领域，这个通常是依靠家庭社会关系和派系维系的感情和道义经济的世界。

这类社区为本的公民参与，他们参与的议题、途径、框架都呈现出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跨越社区的边界，进行彼此的呼应互动和交融，可以说，这类公民参与已经从抗争维权走向社区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和新的意义的建构；从社运到新社运，从政治到文化，从街头到日常。

这种香港公民参与的新趋势，即从街头的那种浓缩、戏剧性、倡导动员性、强调民意及舆论的串联性社会运动形势走向社区内部的日常的、基于社区利益和文化价值诉求的参与使得香港的公民社会开始接地气，影响到更多普通公众的参与。而社区内部的参与，也从公共空间/领域和社运议题的公共事务的讨论转到到更长期日常、持续性的日常生活、生计、生态及文化等面向的长期践行和渗透，这种从社区的公共参与转向日常参与，衔接起香港的私人 and 公共领域，真正实现抗争的落地，进而也给了香港人一个超越中环价值的机会，有了另类生活的选择。香港开始呈现为更加多元的社会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公民参与面临的挑战和张力。因为这类参与仍然是由相对精英小众的后现代/后物质主义的年轻人来引导和动员，在他们的文化理念先行下，这类生活运动是否可以真的在社区基层民众间扎下去，是否真正能够推动香港公民社会的持续发展，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这是一个未来不确定的香港，这也同时意味着香港革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Arnstein, S.R.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9, 35(4): 216-224.
- [2] Kres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Rethinking a Curriculum of Communication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96, 32(2): 185-196.
- [3] Davidson, A. From Subject to Citizen: Australian Citizen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吕大乐, 陈健民. 在家庭与政治社会之间: 香港民间社会的构成 [A]. 陈祖为, 梁文韬. 政治理论在中国 [C].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吕大乐和陈健民认为: “这些在四、五十年代移居香港的华人, 基本上视香港为动荡政治环境里的“救生艇”、“浮台”。他们有机会暂时在这个新环境里喘定, 尽管港英政府的殖民地管

治有其倾斜性及不平等的地方，他们宁可逆来顺受，而更普遍的态度是不闻不问，对一般社会事务反应冷淡。”

[5] 金耀基. 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A]. 刑慕寰, 金耀基. 香港之发展经验[C].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5. 6.

[6] 刘兆佳. 过渡期香港政治[M]. 香港：广角镜出版公司, 1996.

[7] Yip Po-keung.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Constraints, Problems and Risks[A]. Li Pang-kwong, eds., Political Order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Hong Kong[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9-186.

[8] 杨森. 香港压力团体与政治团体的政治角色[A]. 郑宇硕. 香港政制及政治[C].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87. 275-288.

[9] 吕大乐, 陈健民. 在家庭与政治社会之间：香港民间社会的构成, [A]陈祖为, 梁文韬. 政治理论在中国[C].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10] 龙应台. 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A]. 龙应台.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 25 号[M]. 香港：天地图书, 2006. 龙应台用“中环价值”概括香港的主流文化及价值观：“中环代表了香港，‘中环价值’垄断了、代表了香港价值：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里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标。”

[11] 周八骏. 集体回忆的政治分野[N]. 文汇报, 2006-12-26.

[12] 吕烈丹. 不再在精英的口袋里——利东街运动对文物保育概念的启示[N]. 明报, 2007-2-7(D04).

[13] Snow, D and Benford 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A].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M]. 1988. 197-217.

[14] 关注组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民间绿皮书”中“关于我自己”的介绍，
<http://ursreview.blogspot.com/>，2009年12月15日。

[15] H18 为前土地发展公司给与重建项目的编号，范围包括卑利街、嘉咸街、结志街、威灵顿街、阁麟街、吉士笠街、士他花利街及干秀里。中西区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地区，当中位于中环的嘉咸街街市更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早的露天市集，距今约有 150 年历史。

[16] 明报, 2006-6-25

[17] 2007年6月，民主党、民建联都曾举办讲座，内容只集中于赔偿安排。

[18] 菜园村的村民基本上是非原住民，大多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从大陆移居过来，通过向原居民租屋或买地自建的方式获得安身之所。

[19] 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从香港都市核心区-中环上环寸土寸金的街区，到香港乡村/离岛地带，从中心到边缘……。如果说历史文化保育在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下，依然有保护的合法正当性的话，那么农村地带，尤其是非原住民的村落，寻找自身的合法正当性的空间则更小，在不同的框架下，失去文化保育的框架之后，又要反资本主义和坚持后物质主义，不止步于“民主规划”的要求和提法，并且要在香港这样的都市强调农耕的价值，强调保护没有土地产权的非原住民，更加困难。

[20] 马国明. 菜园村抗爭運動揭示香港媒體與時代嚴重脫節. 香港独立媒体 2011-02-11
<http://www.inmediahk.net/>

[21] 杨兴云, 王未佳. 高铁之争：香港这样做. 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网 2010-01-29, www.eeo.com.cn

Hong Ko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w trend of civil society

ZHOU Runan ZHU Jiangang

(School of Philanthrop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ctively promote urban renewal of the old blocks and large-scal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and local features, triggered a series of social concer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bout the soci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issues which from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lso tremendous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s civil society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Hong Kong's civil society is also present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actively participate of Hong Kong citizen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evolution of this kind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to the meaning of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Keywords: Hong Ko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Civil Society, Active Citizens

收稿日期 : 2014-01-06

基金项目 : 本文属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研究》(12AZD027) 和 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转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12&ZD007) 的成果。

作者简介 : 周如南,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研究员,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 朱健刚,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